

ANTHONY GIDDE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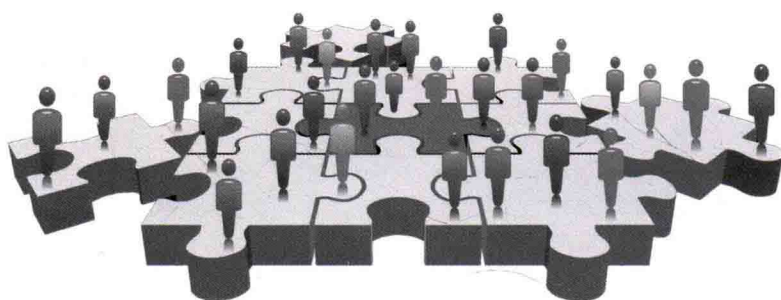


社会学

第七版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英) 菲利普·萨顿 著 赵旭东 等译

下



SOCIOLOGY 7th edi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社科·学术面对面

SOCIOLOGY

7th edition

社会学

第七版

下

〔英〕安东尼·吉登斯 〔英〕菲利普·萨顿 著 赵旭东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第 14 章

全球不平等

目 录

全球不平等的语言 / 550

全球不平等 / 551

 经济不平等的测量 / 551

 全球经济不平等是否在加剧? / 553

 “人类发展指数”中的趋势 / 555

不平等的生活机会 / 557

 健康 / 557

 饥饿、营养不良与饥荒 / 558

 教育、读写能力与童工 / 561

变迁中的人口 / 564

 人口分析:人口学 / 566

 人口变迁中的动力 / 566

 人口转变 / 569

穷国能够变富吗? / 571

 发展的理论 / 577

 发展理论的评价 / 583

 国际组织与全球不平等 / 584

 一个变迁世界中的全球不平等 / 589

展望 21 世纪的平等 / 590

 章节回顾 / 591

 研究实践 / 592

 深思熟虑 / 592

 艺术社会 / 592

 扩展阅读 / 593

 网络链接 / 594



银行家的薪酬已经成了一个公众关注的话题,随着 2008 年信贷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民众对此怒火中烧。2011 年 4 月,苏格兰议员候选人柯特·弗雷泽(Kit Fraser)站在苏格兰皇家银行外,对该银行的年度会议表示抗议。

2011 年,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主席菲利普·汉普顿(Philip Hampton)爵士,在一次股东会议上说:“我们需要聪明上进的人才,同时我们也要能够为他们提供公平的待遇。”但是公平实际上指的是什么,钱吗?苏格兰皇家银行为新的首席执行官斯蒂芬·赫斯特(Stephen Hester)提供了一个价值 770 万英镑的待遇:120 万英镑的基本薪资、200 万英镑的奖金以及未来价值 450 万英镑的股票。2010 年,另一位顶级的银行家,巴克莱银行的首席执行官鲍勃·戴蒙德(Bob Diamond)(此人因卷入操纵利率的丑闻刚刚辞职)所获得的报酬除去 25 万英镑的薪资外还有 650 万英镑的年度奖金。这个奖金由价值 180 万英镑的股票以及以股票和债券形式支付的 470 万英镑的奖励构成。同时,根据其绩效,他还收到了一份价值 225 万英镑的长期激励奖金。最近的一份评估认为,在 2010 年,2,800 位银行家所收到的个人奖金都至少在 100 万英镑,这还不包括他们的基本薪资(Porter and Kirkup 2011)。那么,这样的安排“公平”吗?

在 2008 年信贷和金融危机之后,银行家奖金问题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在 2008 年的那次金融危机中,一些银行倒闭了(包括美国的雷曼兄弟),许多其他的机构(包括像美国的房地美、房地美这样的金融服务公司以及诸如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这样的银行)则由国家政府动用公共资金予以救援,实际上被国有化了。大部分银行部门被指责应对这次危机负首要责任,因为它们将高风险贷款放给了那些信用记录最差的人,也就是广为人知的“次贷”。

自从 2008 年以来,人们对于银行高管的奖金文化一直都有怒火和抗议,特别是那些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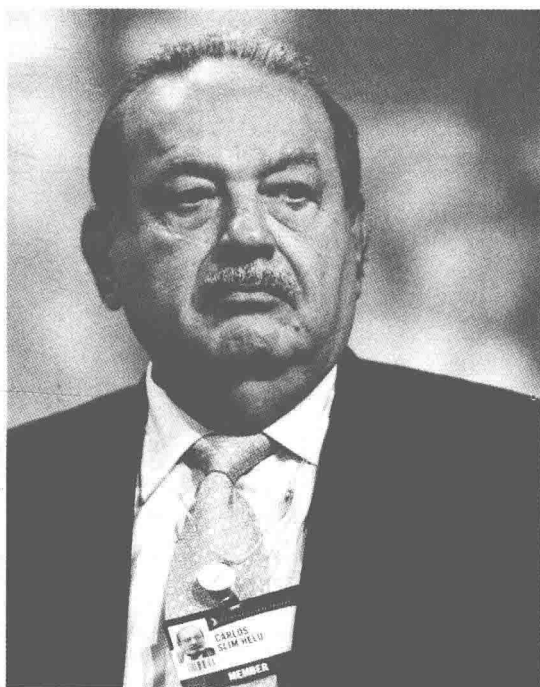
然还需要向纳税人还债的银行。比如,2011年4月,柯特·弗雷泽将自己的外衣脱了,站在股东会议外面抗议持续不断的奖金支付,而在5月份的苏格兰议会选举时,他成了“禁止给银行家发奖金党”的代表。同年,气愤的荷兰顾客通过社交网络联合起来,威胁要大规模地从一家总部在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即荷兰国际集团(ING)撤回存款,这导致了该银行首席执行官放弃了其年终奖,并且劝告其他人也这么做。然而,银行家的奖金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财富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那些富人们的财富是以十亿美元而非百万美元为计的。那么,你觉得为什么银行家受到的责骂要比那些亿万富豪多呢?

参见第7章“工作与经济”中对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的讨论以及第13章“贫困、社会排斥与福利”中的一些政策回应部分。

亿万富豪(billionaire)是指至少拥有十亿财富的人,可以是任何货币,但是出于比较的目的通常使用美元。

2011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富豪榜”显示,个人财富达到了10亿美元的人有1,210位;其中美国413位、亚洲332位(中国115位)、欧洲300位以及全球其他地区165位。这些人的总资产为4.5万亿美元,比德国整个国家的GDP还要多。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来自墨西哥,卡洛斯·斯利姆·埃卢(Carlos Slim Helu)的财富主要来自于墨西哥电信公司,尽管其家族还涉及矿业、房地产业和其他产业。当一般的工人因经济衰退而个人资产缩水的时候,埃卢的个人资产在2010年实际上增加了205亿美元,这部分归功于墨西哥股票市场的上涨,以及比索(墨西哥货币)的增值(Forbes 2011)。

亿万富豪排行榜的榜眼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个人资产为640亿美元,大部分来自于其所持有的微软公司的股票。盖茨是企业家精神的典范:一个迷恋电脑的“呆子”成了一个资本家,其创造的软件为全球绝大多数个人电脑提供了操作系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盖茨的净资产达到了1,000亿美元。但在这个财富巅峰后不久,微软的股票价格开始走低,使盖茨的个人资产大幅缩水。如果比尔·盖茨代表着西方高科技企业家,那么来自中国香港的位列榜单第9位的李嘉诚,就是许多白手起家的亚洲成功商人的代言人。李最初从制造塑料花开始自己的事业,然而到



2011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71岁的卡洛斯·斯利姆·埃卢(以及他的家族),资产总额达到了776亿美元。上图是其在纽约参加2011年克林顿全球行动的照片,该行动致力于将商人与慈善家纳入到非营利与非政府组织中,以寻求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2007 年,其个人资产总额已经达到 265 亿美元,他的财富来自广泛的投资,包括房地产和其家族所有的星空卫视(STAR TV),这一卫星电视的播出覆盖了地球一半的人口。

表 14.1 2011 年 3 月出炉的全球富豪排行榜前 15 名

排名	姓名	净资产额 (10 亿美元)	年龄	财富来源	国籍
1	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	77.5	72	美洲电信	墨西哥
2	比尔·盖茨(Bill Gates)	64.4	57	微软	美国
3	阿曼西奥·奥特加(Amancio Ortega)	53.6	76	Zara	西班牙
4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	48.4	82	伯克希尔·哈撒韦	美国
5	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	41.8	86	宜家	瑞典
6	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Charles & David Koch)	38.6	77	科氏工业集团	美国
7	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	37.2	68	甲骨文	美国
8	克里斯蒂·沃尔顿及其家族(Christy Walton & family)	30.5	57	沃尔玛	美国
9	李嘉诚(Li Ka-Shing)	27	84	长江实业	中国香港
10	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	26	55	信实工业集团	印度
11	利利安·贝当古(Lilane Bettencourt)	24.7	90	欧莱雅	法国
12	斯蒂芬·佩尔森(Stefan Persson)	24.7	65	H&M	瑞典
13	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	24.2	48	亚马逊	美国
14	伯纳德·阿诺特(Bernard Arnault)	24.1	63	酩悦·轩尼诗 路易·威登	法国
15	拉里·佩奇(Larry Page)	23	39	Google	美国

资料来源: Bloomberg. com。



可以通过回溯第 4 章“全球化与社会变迁”来温习“全球化”。

极少数个人和家族是如何积累到如此巨大的财富的呢? 过去,贵族是通过他们的家族来继承财富与资产的。但是现今极少有人依靠此法致富。2011 年的亿万富豪排行榜当中多数人的财富可以被描述为“新兴创业家财富”,这些财富是在一个人一生中迅速积累起来的。比尔·盖茨以及阿曼西奥·奥特加在造就巨大的经济成功以前,都出身平平。两人都受益于全球化:盖茨通过参与推动全球联结的新通信技术而受益;奥特加通过推动诸如 Zara 之类的市场品牌在全球的扩张而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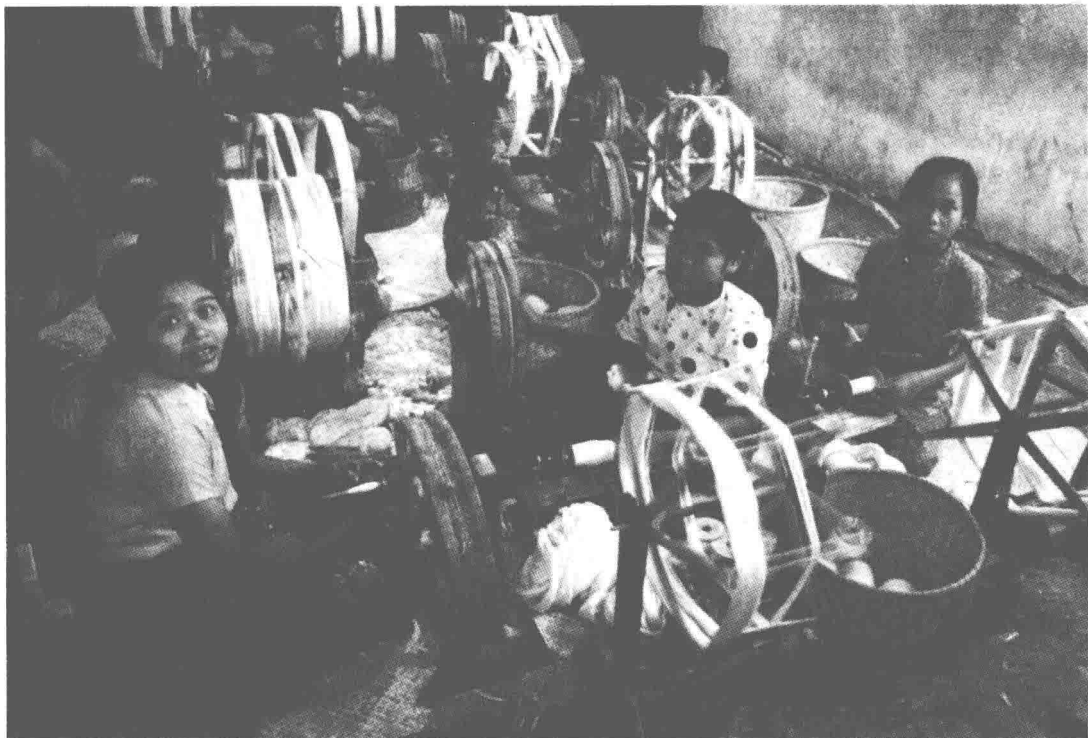
然而,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却并不均衡,它并不意味着人人得享。成千上万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正在沦为全球劳动力,他们常常超时工作,每周工作 6 天,并且每天挣得的不过 1 美元。如果按照相对富裕国家的就业法规,这样极端的工作条件是无法接受或者无法想象的,这些国家拥有较完善的最低工资标准、健康和安立法以及劳动者权利。但对于其他人而言,例如生活在东欧的人,参与全球经济在社会角度和经济角度上都是困难重重

的,而对于那些处于世界经济之外的人来说,情况则更为糟糕。当在全球经济中收入最高者与最低者之间存在这样不可思议的鸿沟时,个体的“公平”要如何计算?对于社会学家而言,这个议题是结构化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并不能单纯地通过追溯个人经历而弄清楚。

批判性思考

1,210个亿万富豪的存在是否能标志着全球经济的成功?为什么可能会有人反对这种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现象?如果那些在血汗工厂工作的人极端恶劣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得到提高,那些亿万富豪的数目持续增长就是可接受的吗?

社会不平等是社会学的基本论题之一,伴随着古典社会学家对新兴的工业社会的阶级、地位与权力的不平等的关注而建立起来的。然而,阶级、地位和权力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更高的层次即全球层面上。正如我们可以讨论单一国家中的富人和穷人、高级地位和低级地位以及有权和无权,我们也可以在整体全球体系中讨论这些形式的不平等以及探究导致这些不平等的原因。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探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不平等(可参见第4章对于更长时段的全球化的讨论)。



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受雇于世界各地工时长、报酬低的“血汗工厂”。全球化真的对这些工人有益吗?

首先,我们要简要讨论下什么是“全球不平等”,并考察全世界人民生活方式的经济水准差异。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一些国家是如何可能改善自己的经济景况的。这将引导我们思考全球不平等的理论,这部分最后我们将估测在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的未来走向。考察完全球不平等,我们将阐释人口结构和人口增长,而这种增长趋势在世



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发展得最快。此处,最核心的问题是人口增长是如何影响生活机遇和平等的前景的。

经济不平等是造成世界贫困、饥饿与健康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它成为了本章的核心关切问题。然而,如前文所述,无论在民族国家之内还是民族国家之间都存在巨大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和全球权力不平等。而后者正是许多根深蒂固的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的某些问题我们会在 23 章“民族、战争与恐怖主义”中讨论。想要获得对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更广泛的分析,读者可参阅相关章节。

全球不平等的语言

用于讨论经济发展与全球不平等的语言是有争议的,而且在过去的 100 年内已经发生过数次改变。在 20 世纪的上半期,这个语言通常是三个世界模型,即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含有每个世界发展程度相对分离的观念。尽管作为对于富裕的第一世界、中等收入的第二世界、相对贫穷的第三世界的基本描述是有用的,但这种分类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今天人们普遍承认,存在一个全球性的现实,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社会,这对认为三个世界实际上是相互分离的实存的观点形成了挑战。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第一、第二、第三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并且如果不知晓某一世界在整体全球体系中的地位的话,是无法理解这一世界的状况的。第二,给相对富裕的国家贴上“第一世界”的标签一直被视为是带有价值判断的,因为它使(低级的)“第三世界”被污名化为欠发展和经济迟滞的地区。这种表述同样也是“指责受害者”的,因为它将相对贫穷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描绘为应为它们常常陷入绝望的状况负责。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三个世界模型并没有解释殖民主义或者西方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剥削的影响。

因为三个世界模型的缺陷,社会科学家开始将世界划分为“发达”社会和“欠发达”社会,广义上说,发达社会是那些处于北半球的国家,而欠发达社会则处于南半球。然而,大部分社会学家放弃了“欠发达”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再次给人一种经济落后的印象,他们转而青睐“发展中国家”。后者是一个更为动态的概念,暗示了运动和持续的经济进步,而非不变的欠发达状态。延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将南方的欠发达状况与北方的发达状况联系了起来。在此,富裕的国家看起来是在积极地使南半球的国家保持欠发达的状态,这样就能确保西方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展。这一视角我们后面将会详细讨论。

不过,对一些人来说,即使是这种改变也仍然过于接近关于经济发展实际涉及什么的西方观点。一些最近的学术研究开始采用“多数世界”这一术语来指称(广义上)处于南半球的相对贫穷的国家,而用“少数世界”来形容北半球相对富裕的国家。这种概念化的一个好处是,它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即当只覆盖很小一部分世界人口的少数国家享受舒适的生活方式时,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仍然生活在严重削减他们生活机遇的相当贫穷的状况中。然而,这种分类并没有谈及世界不同区域的经济状况。

由于我们主要(而非唯一)讨论的是全球层次上的经济不平等,所以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使用“发达”来指称那些收入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已经相当高的国家,而用“发展中”来讨

论那些目前收入水平较低但正处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中国家”包括旧模型中的大部分“第二世界”国家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尽管之后的整个讨论中我们将借鉴国家个案研究并厘清具体指涉哪些地区和国家。无论使用哪个概念,重要的是要理解全世界国家的不同经济状况是如何适用于这样的分类图式的。

全球不平等

全球经济不平等主要指国与国之间在财富、收入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当然,国家内部也存在着许多的差异:即便是当今最富裕的国家,穷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同时不那么富裕的国家也正在产生许多世界的巨富。社会学的挑战不仅仅在于指出这些不同,而是要解释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又如何可能克服它们。

经济不平等的测量

从全球不平等的角度来对国家进行分类的一个方式是,比较它们的经济产出。一个重要的经济产出的测量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一个国家的GDP主要包括一国之经济在某特定年份生产出的得到记录的全部物品与服务的总值。而个人或企业在国外的收入则不计入其中。另一重要的替代指标是国民总收入(GNI)。与GDP不同,GNI包括了该国个人和企业的海外收入。测量经济活动的指标,如GDP或GNI,常常要计算人均值;这使我们可以对一国之内普通居民的财富进行比较。同时,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状况,我们需要使用同一个货币单位,像世界银行一样的国际组织绝大多数使用美元。而我们将使用美元并偶尔会用英镑。

世界银行是一个国际贷款组织,其为贫困国家的发展计划提供贷款。它使用人均GNI将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这个分类体系将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生计水准的差异。为了更加简单,我们通常将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类别合二为一。

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11a)将155个国家划分为三个等级。世界上另有58个经济体,世界银行并没有提供数据,要么是由于数据的缺乏,要么是因为这些经济体的人口少于100万。2009年,人均GNI达到或低于995美元的国家被划分为“低收入”,人均GNI在995美元到12,195美元之间的国家被划分为“中等收入”,那些人均GNI达到以及超过12,195美元的国家被划分为“高收入”。世界上的人口只有15%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由此证明了“少数世界”的标签。

不过要谨记,这种分类是基于各国的平均收入的,因而掩盖了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尽管我们不在本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但是这类差异可能非常显著。比如,世界银行最近将印度从低收入国家调整到中低收入国家,因为其人均GNI已经从1999年的450美元提升到了2009年的1,220美元(World Bank 2011a:11)。然而,尽管印度有着数量庞大且在增长中的中产阶级并于最近发展了空间探索计划,但是仍有大量的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与此相似,中国在1999年由低收入国家被重新划分至中等收入国家,2009年其人均GNI达到了3,650美元。尽管中国的平均收入目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

是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贫困当中。在其他国家中,这种内部的经济不平等比比皆是。

但是,单单基于收入去比较各个国家可能会产生误解,因为 GNI 仅仅考量专门为现金售卖而生产出的货物与服务。而许多低收入国家的人是那种自给自足的农民或牧民,并不使用现金交易,这类人的作物和牲畜的价值未被统计在内。各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和千差万别的语言和传统。穷国在历史和文化方面并不比它的富国邻居逊色,即使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要艰辛很多。诸如社会团结、强大的文化传统、家庭和社区的支持系统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资产,尽管对于衡量人民的生活品质是十分重要的,但却不适合于统计测量。

许多环保运动者认为,GDP 以及 GNI 都是一种特别生硬的定量方法,并不能向我们揭示生活品质的问题。甚至那些对自然环境人类生存有害的经济活动,都被简单视作国家总产出的一部分,从而变成了对经济福利的贡献力量。以长期的环境可持续的视角来看,这个方法是完全不合理的。如果我们再将上文提到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计算在内,那么将可能得到一个与 GDP 或 GNI 持续发展显然“有益”的观点完全不同的结论。

即使我们仅仅基于经济统计来比较各个国家,选择怎样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比较,也可能影响我们的结论。比如说,在研究全球不平等中,我们选择家户消费(包括食品、药品或其他产品的消费)水平而非 GNI 水平进行比较,就有可能得出另一种结论。同样,比较几个国家的 GNI 也并未考虑到真实的开销。比如说,如果两个国家的 GNI 基本相当,但是在前一个国家内,一个家庭在一顿普通的饭桌上只需花几便士,而在另一国家中则需要花几英镑,那么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富裕程度相当就是误解,因为第一个国家的民众的钱可以换取更多的东西。因此,研究者可能使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PPP)来消除两国之间的价格差异。在本章中,我们将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 GNI,但应当注意到,我们还会使用其他几种常用的测量指标。

高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一般是指那些最先工业化的国家,这个工业化的进程开始于大约 250 年前的英国,随后扩展到欧洲、美国和加拿大。而在 40 年前,日本才加入高收入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列,随后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加入到这一范畴中。至于这些亚洲后起之秀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一直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所争论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来讨论这些问题。

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虽然仅占世界的 15%,但却占有全球年度财富产出的 75% 以上。高收入国家会提供体面的住房、充足的食物、干净的饮水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不曾感受到的舒适生活。尽管这些国家也会存在大量的穷人,但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所享受的生活水准对于世界大部分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中等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东与北非的产油国、美洲地区(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古巴和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国家以及南美洲)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及其东欧盟国。这些国家通常在 20 世纪才开始进入工业化的阶段,因此,工业化发展程度(或财富程度)还不及高收入国家。

尽管这些国家中的许多人比之于他们在低收入国家中的邻居,生活要优渥得多,但他们还享受不到高收入国家常见的生活水准。当拥有 13.4 亿人口的中国由于经济的迅速

增长被重新归类,从低收入国家变为中等收入国家时,世界的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有所扩展。这种重新归类产生了一些误导,因为中国在2009年的年度人均收入为3,650美元,属于低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并且其大部分人口仍属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低收入范畴。

低收入国家

最后,低收入国家包括东非、西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区域,柬埔寨及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南亚的尼泊尔、孟加拉国。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农业型经济,并且直到最近才开始工业化。但是,如同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国的案例所示,因为它们成了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一些过去贫穷的国家与区域内的平均收入水平正在上升。

生育率在低收入国家中居高不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家庭要么可以提供额外的农业劳动力,要么可以带来家庭收入。而在富裕的工业社会当中,孩子们更多的是去上校而不是下地劳作,大家庭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下降,因此人们也往往生育更少的孩子。有鉴于此,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是高收入国家的三倍多(World Bank 2004)。



参见第6章“城市与城市生活”中关于城市化的更为广泛的讨论。

批判性思考

将国家按照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进行排序有用吗?对“平均收入”的测量有助于我们理解生活的哪些方面?这种方法又忽视了哪些方面?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来将国家的生活条件与如此不同的文化、社会结构和生活的经济标准进行比较吗?

全球经济不平等是否在加剧?

近年来,全球不平等是在加剧还是在缩减的问题,已经引发了两极化的意见分歧。认为全球不平等在加剧的人指出,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里,全球化已经使得这种始于工业化的不平等趋势愈发恶化。批评者们援引联合国《2007/2008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指出,40%的世界人口的生活条件在人均2美元以下,同时他们的收入只占到全球收入的5%,但是最富的20%的人却占有四分之三的全球收入。特别是,到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将占据全球贫困人口三分之一,而1990年这一比例仅为五分之一(UNDP 2007a:25)。无论在全球层次上还是在许多国家内部,不平等都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剧。

与此相反,其他人则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世界的整体生活水平上已然上升了。许多测量世界上最贫穷人口的生活水准的指数也有所提升。文盲在减少,婴儿死亡率在下降,营养不良也在改善,人们更加长寿,全球贫困(通过每天生活标准低于1美元的人口数量来界定)也在减少(参见表14.2)。

然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这些收益中有许多属于高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与此同时,一些最贫穷的国家的的生活水准已经下降。20世纪90年代对于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而言是一个经济急速增长的年代,但同时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UNDP 2003)却发现,超过50个国家(大部分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这10年中承受着饥荒、全球艾滋病流行、冲突和失败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生活水平下降。例如,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如瑞典),福利国家是以一种再分配的方式运作的,比之于其他国家(比如英国),社会不平等扩大化的全球趋势被有效地遏制了,英国则采取一种更为中间偏右的思路来进行福利改革。



参见第13章“贫困、社会排斥与福利”中对福利国家体制的讨论。

如上所述,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测量全球不平等,将会大大影响我们就该问题得出的结论。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比较了两种考察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方法:第一种只是简单地比较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第二种则将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也考虑在内。第一种看待全球不平等的方式见图14.1。它展示了1980年至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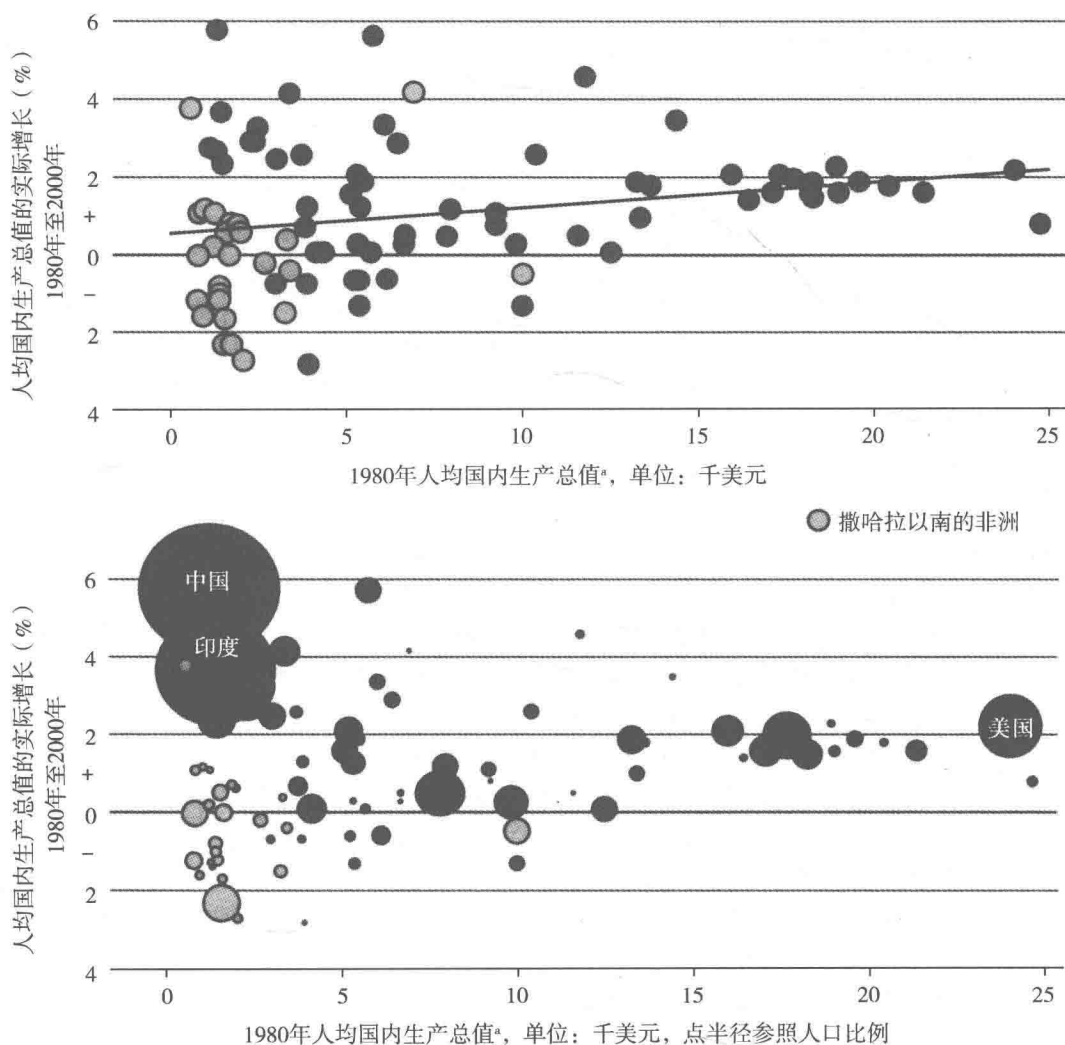


图 14.1 两种考察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方法

注:^a1996 年价格。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2004b), ©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London.

期间,选定的一些穷国与富国的平均收入,其中每个国家在图中都以一个标准的圆点来表示。该图显示,在这一时期内,世界上最穷国家的收入平均值的增长速度要远慢于最富国家。因此,这个走势(以黑线标识的)表明了不平等的增加,因为位于黑线右边的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要远快于位于黑线左侧的贫困国家。如果最穷国家的增长比富裕国家增长得快的话,黑线所表示的走势将会是从左侧向右侧下倾的。所以说,世界各国中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增长的。

第二幅图将国家的人口数量考虑在内,其呈现出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全球不平等场景。图中显示的是同一张图表,但这一次,代表每一个国家的圆点是根据该国的人口数量规模按比例绘制的。图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印度两个国家的标识,这两国都位于全球最大的国家之列,两国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经济规模自 1980 年以来就在增长。由于这两个国家的规模庞大,基于第二幅图绘制的经过人口加权的最佳拟合线(line of best fit)将会下倾,这意味着由于最穷国家的人口平均收入逐步增长,全球不平等正在减缓。从 1980 年以来,这一时期表现最为优异的那些国家,比如印度、中国以及越南,也往往是那些成功地整合进了全球经济并充分地利用了它们的机遇的国家。

“人类发展指数”中的趋势

生活标准的巨大鸿沟将富裕国家内的多数人同他们生活在穷国中的伙伴区隔开来。富裕和贫困从方方面面影响生活。比如,世界上的穷人大约有三分之一营养不良,同时他们中大部分人也是文盲,没有接受过基础的初等学校教育。这里有一个性别维度,因为传统上,女童被认为没必要接受教育,或者说男童接受教育要排在第一。尽管世界大部分还是农村场景,但是十年内城市的穷人数量很可能超过农村地区。

 在第 6 章“城市与城市生活”中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更为详尽的讨论。

不过,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多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内的状况确实得到了改善。比如在 1990 年 1 月到 2004 年 5 月之间全球的婴儿死亡率从 65‰下降到 52‰,同时,因为医务人员的接生,出生率从 47% 上升到 59%。其他一些测量也显示出这种显著提升(见表 14.2)。

表 14.2 全球生活质量测量展现出 一个进步的图景,1990—2005

生活质量指数	1990—1991	2004—2005
全世界		
每 100 个适龄儿童的初级教育入学率(%)	82.5	88.8
15—24 岁识字率(%)	83.5	87.4
每 1000 个活产儿之中 5 岁内的死亡数	95	76
每 1000 个活产儿中周岁内婴儿死亡数	65	52
由技术熟练的医疗卫生人员接生率(%)	47	59
使用过滤水作为饮用水来源的人口率(%)	78	83

续表

生活质量指数	1990—1991	2004—2005
仅发展中地区(%)		
生活标准日均不足1美元的人口	31.6	19.2
贫困缺口率 ^a	9.3	5.4
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率	33.0	27.0
生活在贫民窟的城市人口	46.5	36.5

注释 ^a贫困缺口率=贫困个体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差距的平均百分比。这个指标用以测量贫困的深度,而非单纯的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比率。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联合国(UN 200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10)基于自己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对40年以来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将“人类发展”的经济指标和非经济指标结合在了一起。人类发展指数包含三个侧面,即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水准,还包含四个指标,即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以及人均GNI(图14.2)。2010年,又新加了三个指标,考虑了社会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及多维贫困指数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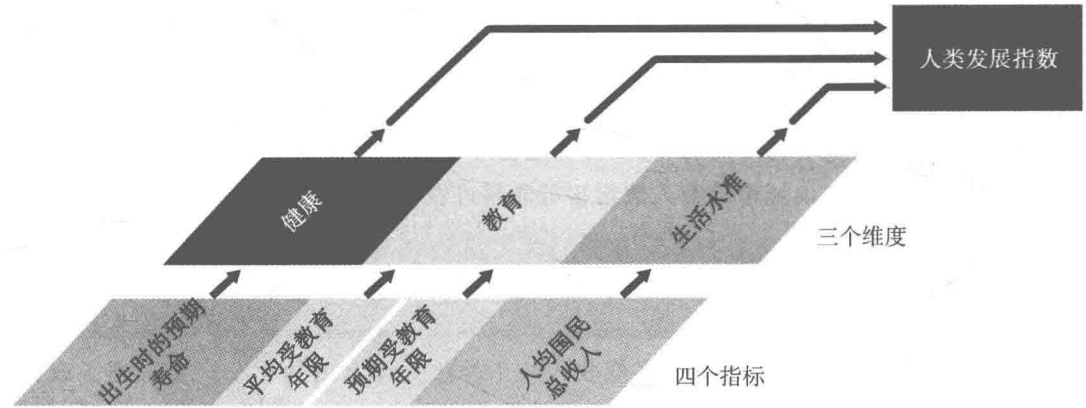


图 14.2 人类发展指数的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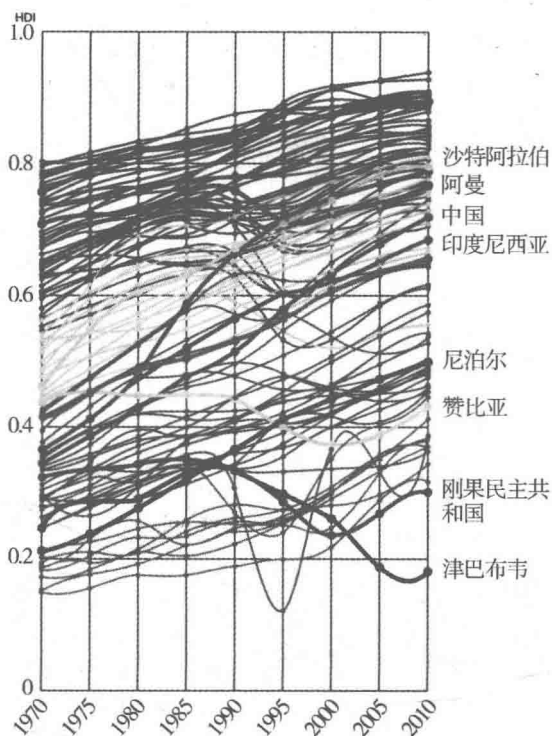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UNDP(2010:13)。

自从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第一次发布以来,这些年度报告一直强调,在经济增长与人类进步之间并不存在“自动连接”。更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如何为政府利用以及为国民所共享的。总体来说,1970—2010年世界各地的HDI的测量都显示出进步,尽管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如此。东亚显示出最快的增长,紧随其后的是南亚以及阿拉伯国家。

对135个国家进行比较,仅仅有三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2010年比1970年要低,它们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以及津巴布韦。图14.3描绘了这135个国家从1970年到2010年的人类发展指数。其中阿曼(一个产油国)进步最多,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尼泊尔和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的进步度排在第11位,尽管其在人均GNI上排在了第14位,这证明“发展”这个更广泛的概念同单纯经济测量相比产生出了非常不同的结果。在前10位

表现较好的国家中,即阿曼、中国、尼泊尔、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突尼斯、韩国、阿尔及利亚以及摩洛哥,只有中国的整体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靠人均GNI的提高,也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人类发展的进步意味着与1970年相比,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整体上与发达国家更相似。但是生活水准的不平等,同1970年相比却增长了,这表明进步是相对的,同时全球不平等仍可能是国际比较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比如,2010年报告(UNDP 2010:29)注意到,1970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在挪威为74岁,在冈比亚为41岁。到2010年,这一差距缩小,挪威是81岁,而当今在冈比亚出生的人们的预期寿命为57岁,但却在生活机会以及自由方面都受到了诸多严格的限制。所以,尽管全球人类发展整体上呈上升的趋势,但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追赶上”发达国家事实上仍需要很长的时间。



注释:增长最快的国家是阿曼、中国、尼泊尔、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增长最慢或负增长的国家有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与津巴布韦。

图 14.3 1970—2010 年部分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10:27)绘制。

不平等的生活机会

社会学家长期研究阶级、族群与性别方面的不平等影响个体的整个生活机会的方式。出生时是男是女,属于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是一个多数族群抑或少数族群的成员,这些都能够影响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我们能从事何种工作的问题。对发达社会及发展中社会进行国际比较,我们发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比同一国家中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更甚。这一部分中,我们将简要呈现出一些同人们的健康、营养和教育相关的关键不平等,同时也将关注持续使用童工的问题。

健康

高收入国家中的人们,要比在低收入国家中的相似之人健康得多。低收入国家普遍存在卫生设施不足的问题,即使有设施也很少为最贫困者服务。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中的人们也缺少适当的卫生设备,饮用水受到污染,感染传染性疾病的风险也高得多。他们更有可能遭受营养不良、饥饿以及饥荒。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身体虚弱和健康不佳,使低收入国家中的人们很容易患病。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许多非洲国家发现的 HIV/AIDS 高发,



每年由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导致的饥饿,以及缺乏医疗保障,致使 1,200 万儿童死亡。

部分原因在于贫民的健康状态不佳(Stillwaggon 2001)。

1970 年到 1990 年之间,整个世界的健康状况在改善,到 2010 年,甚至是在世界上最穷的地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们的预期寿命也比 1970 年时提高了 8 年。在发展中国家,1970 年到 2005 年之间,婴儿死亡率下降了 59%,然而发达国家的百分比下降更多,因此全球不平等的缺口在扩张。2010 年,发展中国家每千活产儿的死亡率仍然是发达国家的 8 倍,在发达国家中儿童的死亡率已经低于 1%(UNDP 2010:32)。

孕产妇死亡率同样也下降了,虽然速度比较缓慢,并且从 1990 年开始这种改善也放缓了。HIV/AIDS 的流行使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情况产生了戏剧性的转变,HIV 的流行率高于 15%,在状况最差的国家内预期寿命是 51 岁,这个水准大概相当于 18 世纪中期尚未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的水平。1989 年后,随着酒精消费的增加、高失业率和高通胀,前苏联国家的男性预期寿命急剧缩短(UNDP 2010)。

饥饿、营养不良与饥荒

饥饿、营养不良与饥荒是健康状况不佳的主要根源,它们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而是长久存在的问题。新鲜的似乎是饥饿与营养不良的程度——事实上,当今世上仍有那么多人似乎正处于饥饿的边缘(见图 14.4)。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UNWEP 2001)将“饥饿”界定为每天摄入热量不超过 1,800 卡路里,而这个数量不足以提供成年人积极健康的生活所需要的营养。自 1980 年以来,全球营养不良的人口保持在了一个特别稳定的水平,大概有 8 亿人,尽管这个数字是从 21 世纪早期 10 亿人的高峰下降至此的(UNDP 2010)。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研究,全世界饥饿人群中 2 亿人是 5 岁以下的儿童,他们由于缺乏充足的食物而体重不足。每一年,饥饿会夺去大约 1,200 万儿童的生命。

然而,那些生活在中等收入或低收入国家的 5 岁以下的营养不良的儿童,他们之中超过四分之三所生活的国家实际上是粮食盈余的(Lappe 1998)。在发达国家,问题在于粮食过剩而不是粮食匮乏,因为肥胖率持续增加以至于备受关注。实际上,有学者认为,在美国人们的预期寿命可能会从 2050 年开始下降,其原因就是与肥胖有关的健康问题,诸如糖尿病、中风和心血管疾病等等(Olshansky et al.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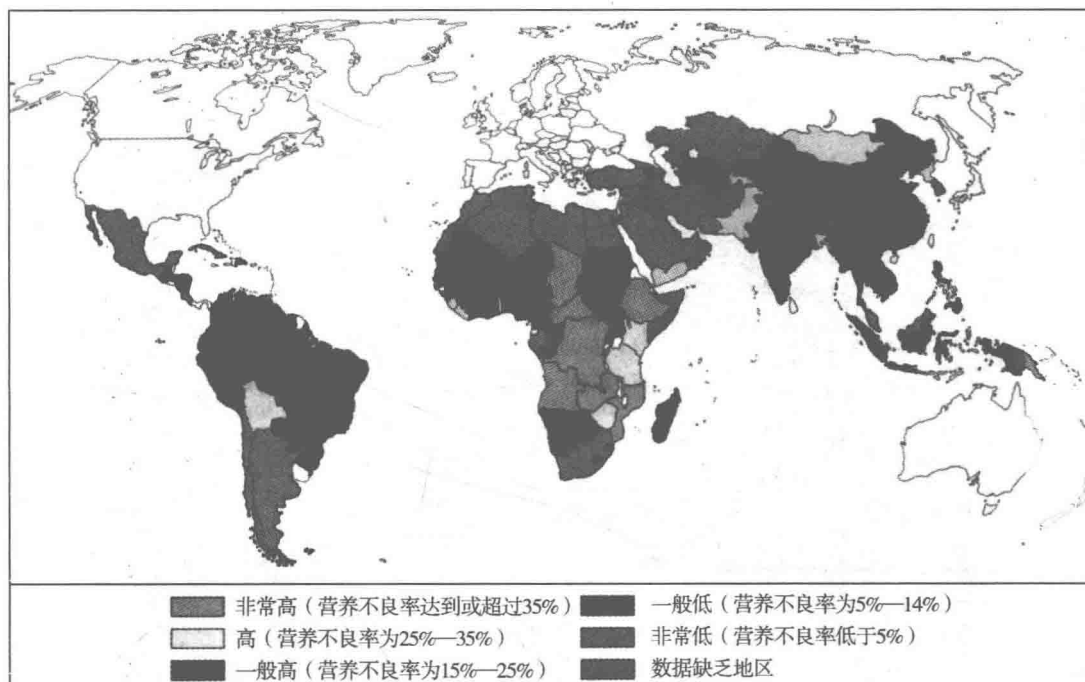


图 14.4 2010 年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的分布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UN FAO 2010)。

饥荒与饥饿都是天灾与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今世界,仅仅是干旱就影响到了大约 1 亿人。在苏丹、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塞拉利昂、几内亚与塔吉克斯坦这些国家,干旱与内战的结合是对粮食生产的毁灭性打击,这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陷入饥饿以及死亡。在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有 5,300 万人营养不良(占全部人口的 11%),这个数字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达到了 1.8 亿(占全部人口的 33%),而在亚洲更高达 5.25 亿(占全部人口的 17%)(UNWFP 2001)。

受饥荒与饥饿影响的国家基本上都太穷困以至于无法偿付新科技的费用,而这些技术原本可以增加这些国家的粮食产量。它们也负担不起从世界各地进口充足粮食的费用。同时,与此相悖的是,随着世界饥荒状况的日益严重,世界的粮食产量却也在不断增长。比如说,1965 年至 1999 年,世界谷物产量增长了一倍,即使考虑到全球人口在这一时期的显著增长,到 1999 年全球人均谷物产量也比 34 年前提高了 15%。但是,这种增长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比如,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人均粮食生产量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同时像美国这类高收入国家固然有粮食盈余,但最需要这些粮食的国家很少买得起。

全球社会 14.1 世界吃什么? 世界应该吃什么?

2000 年,摄影师皮特·门泽尔(Peter Menzel)同旅行家费丝·迪阿卢西奥(Faith D'Alusio)共同拍摄了一组照片,记录了不同文化中的家庭一周内吃的东西,成果就是在 2005 年出版的《饥饿星球:世界之所吃》(Hungry Planet: What the World Eats)这本书。他们访问了 24 个国家内的 30 个家庭,考察这些家庭的食物购买清单、花费以及